

### 从碎纸片到60万字高校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被全部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讲课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未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摄影测量原理》。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为“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 回到老师曾经站过的讲台讲课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

# 一门课,六个院士,二十年(下)

◆ 郭路瑶

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某些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轧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右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



在德国留学时,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与友人合影

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 鼓励学生攀登科学高峰

20年来,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讲地理信息系统时,龚健雅以前常讲“单机的、局域网的系统”。而现在,课件上的内容早变成了“广域网的、手机的系统”。

与课程的发展同步,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踏步向前。李德仁记得,刚回国时,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

事,“怎么把曾经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当时在武测,除了上课,每个学者都在“玩儿了命地做科研”,半夜上机是常事。

如今,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到处都在谈论“创新”,谈论“国际一流”。但到了新时代,宁津生却不鼓励学生“动辄提创新”。“搞两三年就让你创新,创国际一流,不现实。还是要踏实一点。”他常对学生说,“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你们作为学生,可以多尝试从1到1.5的创新。”

刘经南的教学风格不同。这位“喜欢挑战”的科学家,思维发散开阔,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诺奖情结”。第一次见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导师坐在桌子对面,语气很平常,但决心毋庸置疑:“你们要做,就做到国内第一、世界第一。”

李德仁则认为,创新源自学科交叉。这一看法,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边际效应观点”:“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几位院士都认为,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测院创刊号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学进军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

的工作。”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为了做一个课题,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开了130321个公式。学生李建成花了26年时间,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46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从中学时代起,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大学时他想到,如果能计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当了博导后,一个“性格有些坚毅”、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刘经南激励他,“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来,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徒弟徒弟都可以做下去!”

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学生一直在埋头编软件,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交流科研进展时,刘经南发现,他抱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

没过几年,3位美国教授宣布,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这个力来自暗能量。2011年,这一发现获了诺奖。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与诺奖无缘,但这个“傻得可爱”的陕西男生,后来将同样的理论方法,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理上。

在这门课上,刘经南好几次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3年前,他正坐在汽车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

20年来,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渴望,那就是对科学高峰的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提醒着,这种渴望不能被扭曲、被异化。

摘自《中国青年报》

## 敦刻尔克



[英]约书亚·莱文/著 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译

### 5.假战争就此结束

英国民众自1939年秋天起就一直期盼着一场盟军联合进攻,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反而是德军在1940年5月10日发动了进攻。此前不久民意调查组织进行的调研发现,八个半月的无所作为使英国民众变得灰心。他们逐渐丧失了原本的信心,对希特勒的态度也各异,有的人是略带勉强的敬意,有的则是憎恶,觉得他是“非人恶魔”。

所以德国成功发动进攻后,这些观念被强化了,而且大部分英国民众还开始认为,希特勒显然是位军事天才,他的战争机器是不可战胜的。实际上,盟军的兵力比德军多一百万,德军的坦克和前线飞机还没法国多。传说中的装甲师,也就是所谓的纳粹无敌部队,其实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而且当中的大部分是次等的训练用坦克,是从捷克抢来的。

现在英国人不仅知道了德国的能耐,还发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有缺点。巴克利去看过这条防线,但不太满意,觉得它会让士兵们只想防守,对军队的战斗力有负面影响。

实际上,马其诺防线算是尽职尽责,它的确从来没有被攻破过。根据后来的情况看,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英军阵地中的很多人都对法国军队本身的能力有怀疑。

亨利·福尔·沃克上尉在1939年的演习中就观察到法国士兵军纪废弛且缺乏训练。他还记得有一组刚来报到的后备军人在军官喊了立正后还大喊大叫,甚至冲他挥拳头。而那位军官只是朝着沃克耸了耸肩。1940年春天,有个法国军官就告诉他,自己手下的兵士气低落,可能不会再上战场了。

英国远征军指挥官戈特子爵手下的军官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很是忧虑,而法国方面也不太可能毫无保留地汇报情况,他必须尽可能高效地组织起自己的队伍,同时与法军保持有效的定期联系,否则随时会有危险。

德国于5月10日发动了进攻后,小国卢森堡的民众迷茫地看着德军的一列列大炮、

装甲车、汽车和坦克火速冲向比利时。年轻的德国坦克兵军官豪普特曼·卡加尼克一路上都很顺利,不想刚进入比利时境内就遇上了雷区。他和他的队伍不得不停止前进,等待清理出一条安全路线。过了一会儿,电台传来消息,提醒前方有雷区和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队伍又停了一会儿,直至最前方的某个排长决定对路面上一些露出来的地雷开火。卡加尼克听到一串爆炸声,随后队伍继续向前。

坦克比较愿意避开村镇,所以走了几英里后,队伍绕着比利时小镇纳沙托的边缘前行。到达一座山脊顶部后,卡加尼克看到了下面山谷里的佩提特村,白色小房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突然间枪声响起,第一声来自村庄,后一声来自左侧森林,随后枪声逐渐消散了。比利时军队的炮手们就在佩提特村后面的斜坡上,准备开炮,但他们很快被德军机枪压制,有的被打中,滚下山坡,有的四散逃开。

卡加尼克呼叫了营队,请求燃料补给,同时要求派兵镇守已占领区域的侧翼,之后继续向前。突然,他听到指挥官大喊“停下!”驾驶员立刻刹车,卡加尼克这才发现眼前有个深约三十英尺的大坑,他的坦克差点滚下去。躲过了这个坑,他继续向前,路上遇到了敌军的一些轻型装甲车,但见它们也都躲开了。

将近日落时分,德军坦克到达达名为罗什欧的小村,开始寻找桥梁准备穿过瑟穆瓦河。第二天早上,他们在河岸岸边搜寻,对岸的敌军地势较高,架起机枪冲他们开火,于是德军决定先向北,到达莫萨夫后再过河。坦克就这样在枪声扫射中前行,最终不损一兵一卒地抵达一处地方,这里的河流仅深两英尺,坦克可以安全渡河。与此同时,德军高射炮对着天上飞过的法国飞机开火,摩托车部队则借由河上的窄桥过河。

德军坦克部队继续向南,朝着本达莱进军,很快他们就进入了据说无法穿越的阿登森林。从沿途被丢弃的装备和抛锚的车辆可以看出,对手意识到德军已经抵达附近后曾惊恐地在树下逃窜。队伍沿着弯曲的大路逼近法国边境,离开德国以来他们已经走了137英里,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个指向色当的路牌。德军的第一个重要目标近在眼前,卡加尼克和他的队友对胜利满怀信心。

对于英军来说,假战争就此结束。

### 3.苦学表演

按道理,导演实践课应该用胶片去拍。但这样做成本太高,所以,老师就用构思作业和排演片段来替代。在田风老师的影响下,黄蜀芹这个班学的不单纯是电影导演,也学表演、美术、音响、化妆、道具、布景……田老师总说,不懂这些,将来怎么做导演?

表演课是导演系的主课。黄蜀芹记得整整学了三年。只是,导演专业的表演更注重构思,要有电影意识,所以,老师会在表演过程中讲到摄影机位。另外,传统舞台表演只有三面对着观众,而导演专业在做小品时,则要考虑电影镜头的多方位性。

田老师说,“你们与戏剧学院的表演不同,因为你们可以有六个方位,除了正面和侧面,背面也可以有戏,而且可以边走边做,可以移动,空间感是不一样的。”花三年时间学表演,黄蜀芹觉得很值。一个导演必须要经过表演训练,必须要有表演体验,才能判断演员和指导演员。

三年级时,黄蜀芹他们班组织了六个表演片段,就是模拟电影场景的舞台演出。同学们互为编剧、导演和演员。对59届导演班来说,是首次正式的导演排练。只是由于经费有限,不能用胶片拍下来,但全班还是用功用心,全身心投入。

因为全班同学总是互为导演,互为演员,所以,就算没轮到自己的戏,同学们也都静坐在台下。田老师竭尽全力给学生们排练,说到激动处,亲自上台示范,比划得满头大汗。在排《创业史》与《一块灯芯绒》时,田老师说:“虽然都是农村题材,但风格不同。《创业史》是史诗,《一块灯芯绒》是市俗风景。前者要讲究造型语言,后者要强调生活气息……”开始,同学们几乎什么都不懂。如何体现电影、舞台的造型?如何摆位置,方向如何把握?田老师说着说着就跃上舞台,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农民习惯蹲着聊天,那他们是怎么蹲的?面朝何方?二人聊天怎么蹲?人多了又怎么安排?”田老师又说,“把这一切安排好了,放进一个画框里,这就叫作造型,绘画语言就是构图。”果然,在田老师的组织下,十几个人物被巧妙安置在一个舞台上,这个“画框”里

的内容立刻就显得凝重有力,显出一种“史诗感”。同样,《一块灯芯绒》,舞台上的人物被合理地安排好后,汉子们、婆姨们各有各的生动语言和个性动作,一幅农村风俗画卷跃然而出。

田老师的西洋画艺术修养在舞台画面上的运用,给黄蜀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强调的“电影要有造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画面感,就是绘画的布局。很久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第五代导演们,就是因为追求电影造型而震动影坛。

这让黄蜀芹又想起了当年田老师的教导:作品不分大小,只分优劣。黄蜀芹在表演方面的进步是很花了一番功夫的,经过三年训练,从无实物到双人小品、多人小品,再到舞台表演,这对内向的黄蜀芹来说,绝对是挑战,也是磨练。六个片段中,黄蜀芹在同学导演的《骆驼祥子》里演过群众演员。那是一场车夫们为四爷祝寿的戏,舞台上摆了几张麻将桌,黄蜀芹和琪琴高娃等几个演穿旗袍打麻将的群众,这没什么难度,黄蜀芹完全能胜任。另一个同学学导演的《虾球传》片段,对黄蜀芹来说就很艰巨了,她要跟男同学

演对手戏,分别饰演“虾球”的妈妈和爸爸。“虾球”则由段祺顺出演。有一段戏是“虾球妈”用搓衣板洗衣服,这个家常动作却让从小没干过啥家务活的黄蜀芹完全摸不着头脑。还有,与丈夫、与儿子都有感情戏,这更让内向的黄蜀芹不知所措。田老师急了,要求她去北海,去大杂院看看家庭主妇是怎么洗衣服,怎么与家人相处的。

在田老师的精心辅导下,学期结束时,这六个片段成为风格各异、形式不一、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准电影作品”。尤其是《骆驼祥子》《伤逝》和《虾球传》这三台戏,不仅吸引了全校师生,还去了中央戏剧学院等地作交流演出。黄蜀芹他们的表演,把“中戏”的同学给镇住了,他们没有料到,“北电”导演班的学生居然演得这么到位,一点不逊色于他们表演专业的学生。后来,这三个剧还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工人剧场公演了两三天,反响很不错。北京电影学院其他各系的同学纷纷表示,“导五九班”是全校最具活力、最精彩的班级。

## 黄蜀芹 沈一珠 夏瑜 写意光影织妙镜

